



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何一民 主編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 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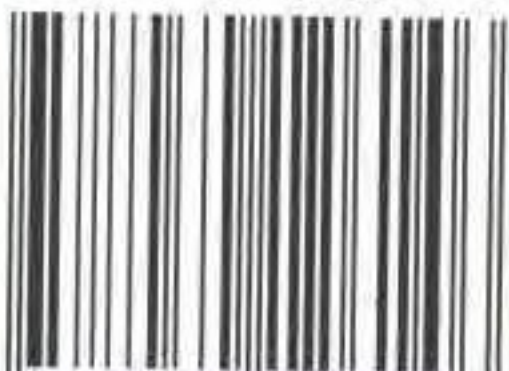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K-0910.0101)

ISBN 7-03-012614-9



9 787030 126146 >

ISBN 7-03-012614-9
定价: 98.00 元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四川大学“十五”“211”工程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宗教文化：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1840~1949年)

何一民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著作,它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城市史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进而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规律和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本书涉及了许多过去尚未研究的问题或研究薄弱的环节,在资料上、理论上都有重要的突破。

本书可供城市管理者、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文史、经管专业的师生和历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何一民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ISBN 7-03-012614-9

I. 近… II. 何… III. 城市经济—经济发展—关系 社会变迁—中国—近代 IV ①F299.29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8681号

策划编辑:沈红芬 侯俊琳 / 文案编辑:李久进

责任校对:刘小梅 /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BS(720×1000)

200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3

印数:1—1 500 字数:880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前言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剧烈的一个时期,而这种变化主要是在城市中进行的,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因而对近代(1840~1949年)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性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在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将城市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去进行历史探索,对于探究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对于整体历史规律的探索都必将有所裨益和启迪。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有着积极的意义。

1996年,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请了“九五”规划重点课题“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该项目得到评审组专家的首肯并批准。其后,四川大学也将本课题纳入“211”工程子项目,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四川大学专门史博士点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本课题主要是通过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剖析,进而探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规律,近代城市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本课题研究涉及了许多过去尚未研究的问题或研究薄弱的环节,在资料上、理论上都有重要的突破。例如,通过研究,首次提出了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和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发展两大规律的发现,不仅对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当前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城市是近代城市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和社会综合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并且为历史学科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探寻一个切入点。

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从单体城市研究到区域城市研究都已取得了一批较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关于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课题不是就城市研究城市,而是将近代城市的发展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中来考察,并着重探讨城市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对城市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本课题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课题研究组的人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城市史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尽可能地采用现代城市学、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本课题的研究路径以文献研究为主,采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主要以近代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为主线,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综合分析的角度研究近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对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和城市发展对城市社会变迁的互动性。

2000年底,研究按时完成,成稿100余万字,通过了有关专家的评审,并得到好评。但由于经费的限制,出版发生困难,因而书稿一直放置在一旁。其间因电脑发生故障,部分稿子有所损失,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200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统战部知识分子处杨泽群处长和四川大学统战部李建国部长的支持下,我向中央统战部申请“华夏英才基金”。经过基金管理委员会严格的评审,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资助本书出版,并给予最高资助额度5万元。这使我非常感慨和感动,并对华夏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和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大学统战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最终的研究成果字数多达百余万字,而华夏出版基金所资助的出版费用无法承担全部内容的出版,因而除了大大压缩以外,还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原有的13个专题减少为8个专题,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城市文化变迁与城市早期现代化、城市社会组织与城市早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社会问题、区域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等专题不得不在本书出版时全部删掉。但值得欣慰的是,本书终于要出版了。

从项目结题到正式出版,其间又经历了两个寒暑,回过头来看本课题研究的最終成果,不尽人意处比比皆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术研究无止境,希望能将这种对学术的不满足转化为学术创新的动力。

全书由何一民设计整体研究框架、工作方案、技术路线,除撰写第一、二、三章外,还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定稿。先后参加本书所涉及课题研究的同志主要有杨鸿校、蔡云辉、赵可、李德英、余文学、刘定国、荣书琴、邱国盛、谯珊、田凯、范瑛、任学丽、扶小兰;参加初稿部分章节撰写的主要有:刘定国、赵可、范瑛(第四章),蔡云辉(第五章),邱国盛(第六章),杨鸿校、谯珊、田凯(第七章),谯试义、荣书琴(第八章)。

李德英、余文学、张百庆、易善连、任学丽、扶小兰所撰写的部分章节因多种原因未纳入本书,但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也需要加以说明,并表示感谢。

本课题的研究和最终成果的出版,一直得到隗瀛涛教授、章开沅教授、马敏教授、魏宏运教授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所长
何一民

2003年5月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1)
第一节 城市性质和类型的变化·····	(1)
一、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性质和特征·····	(1)
二、工业时代中国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变化·····	(14)
三、近代中国城市类型的多元化·····	(27)
第二节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	(47)
一、农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规律·····	(47)
二、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规律·····	(56)
三、外力与内力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双重作用·····	(64)
第三节 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69)
一、开放是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重要条件·····	(70)
二、门户位置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城市的优先发展·····	(72)
三、以贸易为先导是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79)
四、近代工业的兴起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主要动力·····	(83)
第四节 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	(87)
一、近代开埠通商城市的分布与特点·····	(87)
二、开埠通商城市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98)
第二章 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	(112)
第一节 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起步与发展·····	(112)
一、城市化的一般理论与经验·····	(112)
二、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起点·····	(119)
三、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起步·····	(124)
四、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初步发展·····	(131)
五、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衰退与曲折发展·····	(140)
第二节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165)
一、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166)
二、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172)
三、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平衡·····	(181)
四、城市内部结构的不平衡·····	(187)
第三章 近代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的发展·····	(193)

第一节 近代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	(193)
一、大城市的兴起·····	(193)
二、小城镇的普遍发展·····	(203)
第二节 区域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	(213)
一、近代区域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初步形成的条件·····	(213)
二、区域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	(217)
三、东北地区城市的兴起·····	(233)
四、其他区域城市的发展·····	(243)
第四章 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	(251)
第一节 中国城市管理早期现代化的开启·····	(251)
一、传统地方行政体制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251)
二、西方近代城市行政的示范与楔入·····	(255)
三、晚清的警察制度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管理·····	(259)
四、城市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管理·····	(264)
第二节 中国市政现代管理体制的初步确立·····	(271)
一、世界城市改革浪潮对中国市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	(271)
二、城市行政独立化的改革·····	(278)
三、现代城市管理体制的初步确立·····	(290)
第三节 城市行政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发展趋势·····	(303)
一、城市行政体制与民主选举相联系·····	(303)
二、城市立法与行政相互制约体制的初步确立·····	(305)
三、市民阶层参政议政的兴起·····	(310)
四、行政合议制度的初步形成·····	(313)
五、城市行政法制精神的初步确立·····	(315)
第四节 市政改革运动与城市现代化·····	(318)
一、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	(318)
二、近代城市管理改革的局限与制约因素·····	(331)
第五章 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	(337)
第一节 近代城市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征和趋势·····	(337)
一、城市社会的解体与重构·····	(338)
二、等级职业结构的变化·····	(341)
第二节 统治阶层的变化·····	(345)
一、前近代时期城市中的统治阶层·····	(346)
二、晚清时期城市中统治阶层的变化·····	(348)
三、民国时期城市中统治阶层的变化·····	(352)

第三节 知识阶层的变化·····	(360)
一、近代知识阶层演变的趋势·····	(360)
二、近代城市新式知识阶层的来源构成·····	(364)
三、近代城市知识阶层的职业分布·····	(368)
第四节 工商阶层的变化·····	(371)
一、封建城市中的工商阶层·····	(372)
二、传统商人在近代城市中的变化·····	(373)
三、新的工商阶层的崛起·····	(376)
四、新一代民族企业家的崛起·····	(380)
第五节 劳工阶层的变化·····	(383)
一、封建城市中的劳工阶层·····	(383)
二、近代城市劳工阶层的变化及其构成·····	(386)
三、近代城市劳工阶层的来源构成·····	(392)
第六节 游民阶层的变化·····	(394)
一、近代城市游民的变化·····	(395)
二、近代城市游民阶层的来源构成·····	(398)
三、游民的种类及其谋生方式·····	(401)
第七节 城市特殊阶层·····	(404)
一、娼妓业繁荣的背景分析·····	(405)
二、近代娼妓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411)
第六章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415)
第一节 前近代时期的城乡关系及其动因·····	(415)
一、农业时代的城乡关系·····	(415)
二、近代城乡关系变化的动因·····	(418)
第二节 近代城乡关系变动的趋势·····	(427)
一、城乡经济的双向流动·····	(427)
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及人口回流·····	(429)
三、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和破坏·····	(436)
四、扭曲状态下的农村社会变迁·····	(442)
第三节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与影响·····	(451)
一、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	(451)
二、近代城乡关系对城乡发展的影响·····	(462)
第七章 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	(468)
第一节 变迁中的城市居民生活观念·····	(468)
一、辛亥革命前城市居民生活观念的变化·····	(468)

二、辛亥革命后城市居民生活观念的变化	(472)
三、抗日战争前十年间城市居民生活观念的变化	(477)
第二节 变迁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	(479)
一、交往方式的变化	(479)
二、闲暇娱乐方式的变化	(483)
三、消费方式的变化	(487)
四、家庭消费娱乐功能的变化	(495)
五、城市居民消费生活的双重化	(503)
第三节 近代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分析	(513)
一、物价与居民收入	(513)
二、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指数及生活水平考察	(525)
第四节 近代城市劳动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影响	(535)
一、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劳动生活方式的变化	(536)
二、近代劳动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	(546)
三、劳动生活方式变化对近代城市化的影响	(549)
四、劳动生活方式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551)
第八章 近代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之变迁	(559)
第一节 近代城市婚姻观念的变迁	(559)
一、“婚姻革命”新观念的勃兴	(560)
二、“家庭革命”思想的兴起	(564)
三、民国时期婚姻家庭变革新思潮	(570)
第二节 近代城市婚姻与婚姻质量考察	(582)
一、近代城市婚姻的变迁	(582)
二、近代城市婚姻质量分析	(588)
第三节 近代中国城市离婚及影响	(599)
一、近代城市离婚问题概述	(599)
二、近代城市离婚案增多的原因	(615)
三、近代城市离婚的消极影响与积极意义	(630)
四、近代城市离婚问题的基本特征	(634)
第四节 近代城市家庭的变迁	(641)
一、家庭规模结构的变化	(641)
二、家庭功能的变化	(653)
三、近代城市家庭关系的变化	(663)
四、城市移民的婚姻与家庭	(667)
五、近代城市婚姻家庭变迁的特点	(672)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发展 动力机制的转变

第一节 城市性质和类型的变化

一、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性质和特征

城市^①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公元前 7000 年前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了“农业革命”,以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革命,使居无定所以渔猎和游牧为主的原始人群变成定居的农民和牧人,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在距今 5000 年左右,世界主要的农业区域都相继产生了一批早期城市,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手工业、商业结合的,以王权、神权为中心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一般都很小。约翰 R. 拉瓦蒂认为“这些早期的城市中心承担着几种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例如,保护自己的居民不受外来者的侵犯,为其居民及畜群提供安全地带,同时也被用做进行宗教活动和

① 当代中国政府和部分研究城市的学者多以行政建制来确定是否为城市。此一方法是否科学值得考虑,我们主张应采用国际大多数国家政府和学术界认同所用的人口规模和人口职业构成的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研究。

关于城市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相当多的国家和研究者是按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并分别规定有具体的数量界线,即界线以上属于城镇人口,界线以下属于农村人口。就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而言,这一标准较低者是 200 人,或是 1000 人,而采用 2000 人或 2500 人的国家数量比较多。可见各国之间的差异是很悬殊的。此外,有的国家还兼顾人口的职业构成,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非农业人口比重”。

195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明确规定只要符合下列标准的地区,都是城镇:市级或县级政府所在地;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人,半数以上的居民为非农业人口;工矿企业、铁路站、工商业中心、交通要口,中等以上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所在地和职工住宅区等,常住人口虽不足 2000 人,但在 1000 人以上,而非农业人口超过 75% 的地区;具有疗养条件,而每年疗养人员超过当地常住人口 50% 的疗养区。以上四类中,常住人口超过 2 万的县级以上政府所在地和工商业地区可列为城市,其余为镇。“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比较适中。这个规定对城镇居民人口规模的下限定得较低,即 2000 人,但又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超过半数加以限定,因此同大多数国家比较接近。从而与国际多数国家有着可比性。以此观点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城镇应是具有可行性的。

城镇人口的标准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在不同的时期,随着人口总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城镇人口的标准也应有所不同。如 20 世纪中后期,通常将 50 万人以上的城市称为大城市,这种大城市的数量也较多。但在近代史上,一般将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称为大城市。因而研究者不应将现在关于城市划分的标准作为研究历史上城市划分的标准。

礼仪庆典的场所,又并做当地社会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中心”。^①

中国是世界城市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是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大约在18 000年前,早期中国人就开始用简陋的工具来进行耕垦,但仍以渔猎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因而他们不能在一定的地域定居下来。到了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国农业已开始从渔猎游牧业经济中分离出来,农业生产成为人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定居生活开始成为可能和必然。由于第一次大分工,组成氏族公社的先民们开始聚族而居,修建房屋,形成固定的居民聚居点——村落。20世纪以来,这种早期的村落遗址在中国南北各地都有较多的发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财产公有制渐趋瓦解,财产私有制则由萌芽而产生。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扩大,私有制进一步发展,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平等关系逐渐消失,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和阶级压迫也由此而产生。原来氏族中大家公认而服从的习惯权力集中到少数部落首领、贵族、奴隶主手中,成为他们的特权;社会财富也集中到这些特权者手里。由于部落之间或联盟之间时常因彼此掠夺发生战争,同时奴隶也经常自发反抗,因而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对内剥削、镇压奴隶,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私有制财产和人身安全,奴隶主贵族开始建造城郭沟池,从而推动了早期城市的出现。恩格斯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②

大约5000~4000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城市。此一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阶级产生,国家出现。农业生产技术如选种育种、畜力耕种、水利灌溉等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农业成为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类型增多,技术提高,轮式车辆和冶金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业的技术水平取得了飞跃发展;商业也开始兴盛,商品交换的发展促使了商人的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也开始产生和得到初步的发展。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过两次城市发展的高潮。早期城市是以等级制、世袭制为特点,以王室、贵族、军队为城市社会的主体,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处于从属地位,是为第一类人服务的,都城成为区域的中心。而都城中则以宫殿以及祭祀性、宗教性的建筑为中心。这种特性为以后历代城市继承,从而形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特点。

中国在农业时代的几千年间,虽然也曾出现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王朝更替,但文明发展的历史未曾中断,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未曾中断,这就构成了中国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及西欧主要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区别。

^① 约翰·R·拉瓦蒂,《城市革命》,转引自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四卷,第159页。

从世界城市和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城市处于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此一时期中国城市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 中国农业时代城市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

城市完全处于王权的控制之下,是统治集团进行有效统治的政治行政中心与军事中心。城市未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

夏商周时期,城市就是统治者的驻所,并且按照政治权力的大小,行政级别的高低,确定城市的规模等级。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建立,中国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等级体系,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首都为核心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而城市规模的大小也与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成正比。从秦到清中叶,几乎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封建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治机构的驻地,因而也就是中央或地方的政治行政中心。清代,中国城市按政治行政等级划分为首都、省、府州、县四个级别。据《营业方法之变迁》的作者统计,1843年中国共有大小城镇1653个。^①而单是三级政区(以县为主)就有1191个,如果再加上二级政区(府州)358个和一级政区(省)26个^②及中央政权所在城市,与总数相差不大,单纯的工商业性城镇数量不多。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政治行政功能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因为城市是大小不同的统治者驻地,因而中国的城市都修筑有高大宽厚的城墙。城墙的功能一方面是防止外部敌人的入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范内部反抗势力和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加强专制统治的一种方法,这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时代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效,因而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筑城墙作为强化统治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修筑城墙的历史相当早,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就有关于“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鲧作三仞之城”,“夏鲧筑城”等记载,而这些传说也从近数十年来考古学界有关早期城市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目前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为数较多的距今4000~5000年左右的早期城市,如成都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七座规模相当大的早期古城,这些古城的修筑年代为距今4000~4500年左右。中国早期城市不仅修筑有高大的城墙(目前发掘的早期古城,大都发现有城墙),同时也有很多遗物表明这些古城是统治者的驻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筑城的高潮,其时有关修城筑池的记载不绝于书。而秦以后,筑城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墙也成为封建统治和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① 营业方法之变迁,《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第47页。

^② 刘德君,靳润成等,《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其次,由于中国城市是以政治行政功能为主,因而各级城市内部都设有大小不等的统治机构,而这些统治机构从宫殿到一般的县衙门在城市中都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都城,皇宫和中央各统治机构都建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或制高点,如西汉王朝皇宫位于首都长安城内最佳位置的龙首塬北麓,皇宫与官署、贵族府邸区共占长安城总面积的 $3/4$ 左右。东汉都城洛阳建有南北二宫,形成了以宫城为主的城市规划,东汉洛阳“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隋唐首都长安(隋朝称大兴城)的北部正中是宫城,宫城南紧邻皇城,城内左祖右社,市场、住宅区都有严格的区划,整个城市规划对称,沿南北中轴将宫城、皇城置于全城主要地位上,并占据城内较高位置^①。北宋都城开封是三重层环套格局,最中心为皇城,所占面积甚广,为皇帝起居、执政和中央机构所在地。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则是举世闻名的都城,宫城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宫殿规模巨大、规制严整、金碧辉煌、美轮美奂、无与伦比,都城中宫殿居于重要位置并壮丽雄伟,都是为了体现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所谓“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除了都城外,其他的省府州县等大中小城市的规划布局原则也基本上都是为了突出封建政权重要性,各级官府衙门基本上都位于城市的重要位置,这有利于统治者行使统治权。

第三,城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行政中心,一般都驻有数量不等的军队,特别是都城和省会城市以及位于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冲的城市,都驻有数量不等的军队。都城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因而为了防范外部侵略和内部民众的造反,封建王朝在都城驻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如汉长安驻有南、北二军。唐代实行府兵制,府兵经常性的任务之一就是到京城宿卫,叫做“番更”,其时唐王朝都城所在地的关中地区集中了全国军队的40%左右,约26万人,其中约12万禁军驻守长安城,其余的兵力则主要布防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和地区。北宋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王朝采取“强干弱枝”的办法,驻守京城的禁卫军达80余万人,远远超过了京城开封包括皇室官员在内的城市居民人口总数。清王朝建立后在城市中驻防军队更是普遍,由于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关建立起的新政权,为了防范汉族的造反,除了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八旗军,分驻京师和各省主要的城市如成都、西安、太原、南京、南昌等城市,还建立了人数达60余万人的绿营,分驻北京及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咸丰年间,“京师各旗营兵十四万九千有奇”。此外还有大量的被称作“巡捕营”或“京营”的绿营兵也驻防京师城内外。从中国几千年城市发展历史可见,中国城市既是政治行政中心,也往往是军事中心。这也构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重要特色。

2. 农业是农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制约因素

城市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之上,城市的发展以土地

^① 阎崇年,《中国历代都城宫苑》,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财产和农业为基础,农业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城市产业主要分手工加工型、资源型,商业活动地位低下,市场的范围狭小,交换有限,生产方式长期稳定而无变化。

这首先表现为农业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的区位,这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城市的兴起一般都是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在农业时代,城市一般都是分布在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资源较为丰富、农业比较发达、适宜人居和生活的地区;而自然环境较差、资源较贫乏、农业落后的地区城市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至于那些环境恶劣、资源极度贫乏、完全不适合人居生活的地方、没有农业或者农业十分落后的地区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城市。人类早期的城市先后出现在当时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印度河流域。可以看到农业时代的城市从一开始就与农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两河流域,还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都是极其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区,只有相对发达的农业才有可能为城市人口的生存和非生产性消费提供剩余农产品,从而保证城市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粮食作物的生产水平,直接制约着城市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农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规模较大,比如中原地区、关中地区、成都平原地区在古代都是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因而这些地区的城市都发展较快,发展水平较高,如长安、洛阳、开封、成都等城市都是历史悠久、规模较大、人口甚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另外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也与农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农业为城市商业和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原产品,因而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商业、手工业较发达,而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也相应较低。长江下游地区在中古以前,农业不发达,因而城市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但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大量的北方人口、资金、技术南移,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得到开发,从而推动了该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功能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这些政治行政城市也在发展过程中叠加了一定的经济功能,但城市经济主要是为少数官僚、士绅、商人生活服务,只是起着农业经济的补充与调剂作用,具有很大的寄生性,不像在政治领域那样取得对乡村的统治支配权。农业时代中国城市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城市以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业经济具有单一化、低效率、小区域、周期性的特点,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转起着决定性作用。农业的兴衰决定着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兴衰,城市工商业仅是城市的点缀。“手工业如锻冶铺、木器铺等,其主人雇工数人,使操工作,或应主顾之订购,或自计需要者若干,而造相当之物品以出售,是也。……如卷烟,有多数工人皆于各人宅内操其工作,惟其制造之要点则出于大营业者一人之命。故虽制出数家,而无参差不齐之

弊。……不必有大机械、蒸汽、电气之原动力，唯集多数工人于一场。”“商业之范围不广，销售货物往往限于一方。凡百事之规模，类皆狭隘。”^① 农业时代的中国商业以国内贸易为主体，对外贸易量非常小，城市外贸经济极不发达。“以前外国人到中国来的，除外交官、教士以外，差不多只有少数的商人。他们的势力，在以前，并未曾有什么大发达，不过买一点中国土货运往外国和卖一点外国货给少数的中国人罢了。”^② 中国直到明清时期城市经济主体仍然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市场力量弱小，竞争与合作、专业化生产特征不突出，封闭性、保守性和小生产性的特征明显。城市经济力量对社会资源的集聚、辐射作用弱小，经济运行方式明显受到时空的制约，呈现封闭、半封闭的态势。城市经济腹地狭窄，经济结构雷同。商品经济发展不够充分，非经济力量干预强大，国家实行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压制政策，因而也严重束缚了经济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与乡村经济相比较，城市经济不占重要地位，“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③ 农业时代早期，城市经济基本上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早期的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属地是一个经济整体”。^④ 最初的城市是与很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它只是一定地域内手工业活动和交换活动的中心。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加上周围的村庄组成一个独立的城邦。农业时代中后期，城市经济主要是商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城市经济主要由商业活动维持并推动。城市商业日益繁荣，手工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也日渐上升，但商业始终在城市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手工业屈从于商业。城市经济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即使城市中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也是依附于农业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农业时代中国城市成长力量微弱，城市对农村的集聚与扩散功能不强，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不明显。在社会财富、资源分布与集中范围上，农村大于城市，农村赋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城市工商业、服务业的税收属于次要地位，国家以农立国，实行城乡合治。因为在农业时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民的各种赋税，比如人头税、地租税等。即使在城市里有市场，但都是那些达官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发展兴旺起来的奢侈性商业，然而这种奢侈性商业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能说明整个城市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城和市相结合，城市经济主要由商业活动维持并推动着发展。早期城市商品交换的主要内容是农业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最初的城市商品流通中比重很小，不足以主导城市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

① 营业方法之变迁，《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第47页。

② 中国出入口商业的现状，《东方杂志》，第19卷，第9号，第1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卷，第1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卷，第410页。

不断细化,手工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才日渐上升,在手工业与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部分工商业城市。在古代希腊曾出现了以农业为基础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和转运贸易去进行交换的工商业城市。13世纪、14世纪的欧洲已经形成了南部地中海和北部波罗的海两大主要商业区,包括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兰德尔各、布鲁日等工商业中心城市,东西方商品交易十分兴旺。然而在中国并未曾出现过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那类较为独立的工商业城市。农业时代的中国城市主要是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城乡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农村居于主导地位,城市经济对封建小农经济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成为封建自然经济的补充物。中国农业时代的城乡经贸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贸易关系,城市商业的繁荣建立于农副产品的流通上。据统计,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流通的主要商品,流通量占首位的是粮食,其次为棉布,第三为盐,第四为茶。^① 粮食、棉布、茶均为农副产品,这种流通结构表明了城市商业对于广大农村的依赖。因此,在中国农业时代,一个城市往往就是一个以之为中心的区域的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寄生在乡村农业基础上的人口集中地而已,在社会经济体系上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②,是小农经济的补充物,与小农经济一起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因此城市经济不仅不能瓦解广大农村小农经济,反而使小农经济有一定的活力和弹性。而在中世纪的西方,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城市经济具有不依赖于封建庄园经济的某种独立性,并发展成为封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与瓦解者。

但我们也并不否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部分城市的手工业与商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如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不仅是政治行政中心,同时也是闻名天下的工商业之都,时人赞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③ 西汉时期,长安、洛阳、成都、宛、临淄、邯郸等城市既是全国的或地区性的政治行政中心,同时也是著名的经济都会。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城市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加强,一些著名的经济都会出现,如长安、扬州、成都、洛阳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突破了封闭式的里坊制,此一时期不仅大城市而且一些中小城市的经济功能得到增强,集镇也在此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明清时期,南方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因而南方出现了较多的经济都会,明代著名的经济都会有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汉口、佛山、临清、扬州、镇江、成都、重庆等30余个。清代经过康熙乾隆三朝的励精图志,农业时代的中国经济再次出现新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加强,如乾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② 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③ 《战国策·齐策一》。